译者主观能动性——论《论语》译本文化因素的处理

黄雪霞

(厦门医学院 外语教研部,福建 厦门 361023)

摘要:《论语》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论语》译本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在1893年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中第一卷的《论语》,另一个争议大但有影响力的是中国清末民初辜鸿铭的《论语》的英译本。应用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研究两者在文化词语上不同的策略选择,以揭示中国古代文献的翻译规律。

关键词:《论语》;理雅各;辜鸿铭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8)02-0057-04

一、功能目的理论简介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的活动,还是一种文化活动,因此,文化的差异在翻译活动中的处理就显得很重要。每一个国家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文化特定词就是这些文化的载体。《论语》不只是一部哲学著作,还是一部反映孔子所在年代的社会、历史现实的文学著作。在阅读《论语》的过程中,读者会碰到很多的文化现象。对于处理这些文化特定词,有两种翻译手段:归化与异化。前者通过透明、流畅的翻译,为目标受众尽量减少外来文本的陌生感,而后者则是保留着原文本的陌生感以及“外来性”。

本文采用的翻译理论为20世纪发展起来的功能目的理论。此理论超越了它之前纯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视角。对于功能目的论来说,翻译不是一种纯语言的转换行为,而是更有功能性的、更有社会文化导向的翻译概念。目的论为功能理论的最为核心的理论。“目的法则”是功能目的论认为的翻译应遵循的主要原则。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1]12}。在目的论中,源文本不再是处于权威的中心地位,而是译者所使用的多种信息源中的一个,译者之所以采用这些信息,是因为这些信息能够满足译者的某

种目的。功能目的论建立在冯·赖特的理论基础之上,即凡行为必有目的^{[1]29}。功能目的论的代表人物是凯瑟琳娜·莱斯。她提出了功能理论的雏形,首次把功能范畴引入翻译批评,将语言功能、语篇类型和翻译策略相联系,发展了原文与译文功能关系为基础的翻译批评模式。代表人物之一汉斯·费米尔也是根据行为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他认为每个文本都有一定的目的。译者必须遵循三大法则:目的法则(skopos rule)、连贯法则(coherence rule)以及忠实法则(fidelity rule)。其中关系是:目的论地位高于连贯法则,连贯法则又高于忠实法则^{[2]17}。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2]59}前者叫作“异化法”,后者为“归化法”。本文研究侧重于《论语》两个译本的文化方面,尤其承载较多文化信息的术语的译法,文本选取的是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在1893年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的《论语》,以及中国清末民初辜鸿铭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语》的英译本,以探索译者主观能动性对译文的影响。

二、译本分析

理雅各是著名的传教士、翻译家、汉学家。在

传教的过程中,他发现东西方由于缺乏沟通,特别是作为传教士的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了解甚少,而这对于传教是不利的。于是,他决定翻译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的几部中国经典。也是在这样的动机下,他开始了翻译《论语》的伟大事业。他翻译态度认真,影响很大。他的译本现在仍然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参考较多的文本之一^[3]。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马来西亚。在欧洲学习期间在文学上受到了严格的训练。他对西方浪漫主义对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认为真正进步的高级状态的国家是中国。所有这些教育经历成就了辜鸿铭成为一个文学家、翻译家。对他来说,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主要是看人文的建设,而中国的人文建设就是儒家思想。辜鸿铭认为,过去一些高度直译的译文对于英国人来说会“像看不惯中国人的服装和外表”一样不习惯中国的经典著作^[4],他翻译《论语》不是句对句、词对词的翻译阐释儒家经典著作的思想,而是试图通过全新的译文改变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对中国文明的成见,形成正面的文化形象,达到宣传中国文化的目的。

良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良名指的是对于一个文化群体所独有的人名、生物名、地名、机构等等的名字^[5]。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集中研究人名、物质名、机构名等。本文对《论语》中出现的一些人名,以及物质名的两个译者的译文进行对比,以显示译者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一个带有目的的人对同一原文进行不同的处理,显示不同的效果。本文采用的译本是 1893 年理雅各在伦敦出版的《中国经典》中第一卷《论语》译本以及 1898 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的《论语》译本,中文注解采用 1980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1. 人名的翻译

例 1,在第二章第五节有孟懿子问孝。理雅各的译文为:Mang I asked what filial piety was. 再加注 Mang I was a great officer of the state of Lu, by name of Ho - chi(何忌)… 仲孙,叔孙,and 季孙。……懿,‘mild and virtuous’ was the posthumous honorary title given to Ho-chi. On 子^[6]¹⁴⁷。而辜鸿铭的译文为:A noble of the Court in Confucius’ native State asked him what constituted the duty of a good son^[4]¹⁸。在等级制度发展较早的中国,人名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显示。孟、仲和

季常用于人名,表示取名者在家族中出生顺序是第一个,第二个或者第三个^[6]。人名又可以显示家庭背景,尤其是显赫名望家族。这些都是中国取名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由于辜鸿铭追求阅读的流畅,经过译者的主观判断,这些人名并非英语读者所关心的方面,因此在翻译时只是简单地用某人,或者一个哪里人来表示:“孔子本国的一个贵族”,而理雅各则是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直译,并用大于译文的篇幅,用注释把孟懿子所处年代、所处社会地位等等文化信息传达给了读者。

例 2,《论语》第二章十九节出现的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理雅各对哀公的译文是 The duke of Ai 外加脚注哀公是懿号^[7]¹⁵²。辜鸿铭的是 The reigning prince of his native State^[4]¹¹。在古代中国,当权者会给予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或者是品德优良的人一定的名号以纪念他们或者通过这种方法弘扬良好的品德等,这叫懿号。在翻译鲁国当权者哀公的时候,辜鸿铭省略了哀公的名字而代之以一个他的社会地位的解释。显然对他来说,哀公对于他的受众,最广泛普通的英国读者来说,就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而已。而理雅各则是不厌其烦地将大量笔墨用在对哀公个人信息及其所处地域特色的文化上面。他用直译将“哀”翻译为 Ai,将“公”翻译为 duke,显示他的地位;他又加了一个注,告诉读者哀公是他的显示身份地位的名号、他的名字、他名号的意思等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将发现这些注释是很有用处的,因为它显示出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阅读这些注释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耐心,大量的注释将影响阅读的速度以及流畅度。实际上对于普通的英语母语读者来说,或者译者当时的环境来说,花大量时间去阅读注解是很不切合实际的。即使对于普通的中国的读者,熟悉这些人物都是有些困难的,虽然对于背景的了解越多,就越能了解当时的文化。虽然矢志不移地将中国各方面文化传达给受众的理雅各采取直译或者音译加注解来处理这些文化因素,但辜鸿铭采取了替代、省略直译加解释等等的方法来处理不同的人名,让读者有精力、时间充分了解孔子的话语所蕴含的各种思想。

例 3,第五章第七节的子曰:“道不行,承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对于后半句,理雅各译文为:He that will accompany me will be Yu^[7]¹⁷⁵。辜

鸿铭译文为: If I take anybody with me, I will take Yu, referring to a discipline. 加一个脚注 The St. Peter of the Confucian gospel^{[4]30}, 完成这个人物的翻译。由于孔子的一些弟子的名字在《论语》中曾多次提到, 对于这些人物应该有一些了解才能更好地了解其中表达的意思, 辜鸿铭采取了直译加注的方法。理雅各则用直译来传达文化信息。在以上这节翻译中, 出现了《论语》中孔子的另一个学生仲由, 为了帮助受众理解仲由在孔子众多弟子中的特征, 辜鸿铭使用了类比(孔子学生中的圣彼得), 圣彼得是圣经中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一个脾气直率的弟子。而仲由性鄙, 好勇力, 性伉直, 这个类比能让读者最直接的了解人物的特征。相似的类比方法也出现在尧舜以及周公的翻译上。在对这些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人物进行了直译后, 辜鸿铭能做到在目标语中找到一个相近的对应的名字, 以此来帮助目标受众更好的理解译文。在“尧舜”的翻译中, 给了“中国古代的国王尧与舜”之后, 他继续添加了一个注解“中国历史上的亚伯拉罕与以撒(圣经中人物, 笔者注)”。而在对“周公”的翻译中, 他是这样处理的: “周朝的君主”, 之后是注解“中国历史中的摩西或者梭仑”, 摩西是圣经中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且立法的人物, 而后者是古雅典的立法者等等。

2. 物质名的翻译

物质名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社会群体的物质成就体现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 事物包含食物、服饰、工具及其他的手工制品上具有某个社会群体特征的东西。对物质名的翻译两人也有不同, 如: 第七章第六节, 子曰: “饭疏食饮水, 曲肱而枕之, 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理雅各对“饭疏食饮水”的译文为 With coarse rice to eat, with water to drink^{[7]200}, 而辜鸿铭的译文为 Living upon the poorest fare with cold water for drink^{[4]52}。在中国, 水稻孕育着中国文化, 根据考古发现, 浙江余姚河姆渡在六七千年前就已经会种植水稻, 三千多年前已经是古代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地。当时英国人长时间的主食是肉类, 副食是面包, 土豆是航海时代从南美洲

传入的。两国饮食文化不同。译文“the poorest fare”让读者更容易理解文句, 代价是用 fare(食物)两字把具有文化色彩的部分概念化, 含糊, 弱化了。理雅各的翻译“coarse rice”显然更有具象的文化韵味。再如第六章第四节: “子华使于齐, 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 ‘与之釜。’请益。曰: ‘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对于“釜”的翻译, 理雅各采用“fu”, 然后在注解中解释釜为量词以及釜的大小^{[7]185}。而辜鸿铭则只是简单地用“so much”, 意为一定量的, 再加上注解“比孔子说的量更大的量”^{[4]40}, 简单带过“釜庾秉”等量词的翻译。其对于一个古代计量单位的翻译, 显然省去了读者思考计量单位大小的时间, 但代价是也失去了一个文化词语的传达时机。

三、总结

以上的例子显示了两个译者各自主观能动性带来的译文差异。由于翻译主观目的不同, 在翻译中采用的翻译策略也会不同。为了能传达更多的文化信息, 让读者能够感受到多彩的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文化的许多独特的方面, 理雅各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但是这一策略需要读者有极大的耐心去阅读繁多的注释。所以, 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或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是他的主要受众。而对于普通的想要了解中国经典的读者来说, 字对字, 句对句, 繁多的注释不是一个理想的译本。考虑到这一点, 辜鸿铭采取了把目标文本搬到读者面前的归化策略。“为了把中国人的思想道德面貌给广大的普通的英国读者”, 让“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像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那样, 假如他要传达中国圣人要表达的同样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东西文化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为了除去英国读者对中国文化中某些东西的陌生奇怪的感觉”, 辜鸿铭“在任何可能的地方, 除去所有的中国的良名”^{[4]39}, 而这一点跟霍克斯在处理《红楼梦》的时候有相似之处。总的来说, “目的决定方法”, 从这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可以得出, 同一个原著在不同的译者那里都得到了更多的展示生命力的机会, 给读者更多的阅读体验。典籍应该不断地翻译, 以释放出更多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2] Shuttleworth M, 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rooklands[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 [3] 岳峰. 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44 - 58.
- [4] Hung - ming Ku.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898.
- [5]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70.
- [6]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3-14.
- [7] James Legge. Chinese classics(I)[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3.

A Comparis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Aspects of Two Influential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UANG Xuexia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Xiamen Medical College, Xiamen Fujian 361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functionalist approach, this thesis compares translation of the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two influential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using the Skopos theory, in search of the essentials of the translations techniques and rules for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Keyword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James Legge; Ku Hung-ming

(责任编辑: 沈建新)